

《喜福会》中母亲的内在性

周宁，谭琼琳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410082)

摘要：《喜福会》是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书中详细描述了四对华人母女的人生经历。本文运用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剖析书中母亲的形象，以揭露二战前后的中国妇女所遭受的压迫。

关键词：谭恩美；《喜福会》；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内在性

中图分类号： I1

文献标识码： A

《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出生在清朝末期，当时的男权社会为她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将她们的言行和思想牢牢地束缚在方寸之内。她们从小便被灌输男尊女卑的思想，认为女性应屈从于男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女性没有自我，她们受到男性的奴役，以男性的喜恶为喜恶，自觉地充当着第二性的角色。她们被禁锢在一个个小家庭之中，被动地接受社会和男性强加给她们的命运。

1. 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

纵观《喜福会》，我们可以看出在旧中国，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情况极为严重，但女性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她们依附于男性不仅是由当时社会的制度决定的，也是由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决定的。在抗日战争前的中国，清朝刚刚覆灭，男性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女性的职责是生儿育女，做一个家庭主妇。女性犹如笼中鸟被困在一方方小院里，依附于男人而生存。而掌管中国经济命脉的行业被牢牢掌控在男人手中。因而，从整个社会而言，男性的地位远远高于女性。

在家庭中，男性掌握着经济大权，女性则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因为没有收入或收入过低，无论女性想要获取什么，都要从男性身上着手。有的通过讨好男性来达到目的，有的则凭借其他方式让男性答应自己的要求。吴青的二姨太则抓住了吴青的弱点，经常以假自杀的方式来逼迫吴青让步。凭借这样的手段，她得到了房子和金银珠宝，夺走了四姨太儿子的抚养权，并成功地让吴青收回了对四姨太的承诺。而四姨太也就是安梅的母亲原本希望通过讨好吴青来得到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个愿望却因二姨太而破灭，她最终绝望自杀。尽管际遇相异，吴青的二姨太和安梅的母亲有着一个共同之处——她们对吴青的依赖。二姨太的自杀要挟和四姨太的卑微乞求，实质上都是企图从吴青那里获取经济利益。在她们看来，从男性身上得到经济上的支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除了依靠男人，她们别无他法。而一旦男人无法或不愿给予她们经济来源，她们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这也是安梅的母亲绝望的原因之一。

女子结婚前在经济上依靠父亲，结婚后依靠丈夫，丈夫死后则依靠儿子。从顾映映婚前家中庆祝中秋的活动以及婚后家中奴仆使唤情况可以看出，顾映映的娘家和夫家皆是十分富

裕的。嫁人前，她依靠着父亲生存，而当她嫁给第一任丈夫之后，顾映映成为了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依附于丈夫生活。一失去丈夫的宠爱，她的地位便一落千丈。琳达成为童养媳后一心侍奉婆婆和丈夫，夫家不允许她外出工作。因为要依靠丈夫生活，她的地位十分低微。经济上的不独立让她对丈夫和婆婆言听计从，无力违抗，即使有再多的苦楚和不公也只能默默忍受。而吴素云在离开中国前是一位国民党军官的夫人，没有自己的工作，只能依附着丈夫生活。

女性在经济上依赖于男性在旧中国是极为普遍的，这是整个社会的状况，它令父权制度更加牢固，也使男尊女卑思想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在无形中给女性套上了一层枷锁，女性若不摆脱它，就永远无法得到自由和平等。如果女性能脱离男性，自主坚强地生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

2. 男权社会的规则对母亲们的压迫和摧残

旧中国的封建思想束缚了女性的自由和尊严，中国旧社会要求女人要服从父亲，丈夫和儿子，如此女人一生中永远只能听从男人的安排，在男人面前她们丧失了话语权，只能像菟丝花一样依附于男性，对自己的命运也只有被动地接受。

在旧中国，女性没有婚姻自主权，在婚姻上必须听从父母的安排。琳达两岁时就被母亲许给洪家做童养媳，她的婚姻由不得自己做主。不止如此，父母们对儿子的态度和对女儿的态度大不一样。男性被当做是家里的顶梁柱，受到尊重。而女性的地位和价值不是由她自己的努力或能力决定的，而是由她的父亲或丈夫的地位以及对她的态度决定。龚林达认为“中国人称女儿是赔钱货，其实也未必一概如此，那得取决于是怎样的女儿”（谭恩美，2010：41）。女性的普遍地位十分之低，但若是能嫁给权贵或富豪，女人的价值便会提高。当洪太太上门向琳达求亲时，琳达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千金’，犹如一块诱人的喷香的可口的点心那样招人馋”（谭恩美，2010：41）。从那以后，琳达的母亲就把琳达当成洪家的人，一言一行都以洪家的媳妇为标准来要求她，仿佛她存在的价值就是嫁到洪家去。“因为我已经许配给洪家做媳妇了，所以家里似已将我看待成别姓人。”（谭恩美，2010：43）她的母亲一直给她灌输侍奉公婆，听从丈夫的思想，努力把她培养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和媳妇。

男人不允许女人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嫁人后女子要服从丈夫，以夫为天，做一个顺从贤惠的媳妇。琳达进入洪家做童养媳后，努力侍奉婆婆，照顾丈夫，对他们言听计从，不敢有丝毫违抗。她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贤妻良母，无论是烹饪还是女红都无可挑剔，连吹毛求疵的洪太太也无法找出瑕疵。即便如此，她仍然遭受婆婆的无理刁难和丈夫的冷淡厌恶。丈夫不愿与她圆房，婆婆却因为她没有怀孕而责难她，这一切并非她的过错，可她至始至终都未说出真相。于她而言，这是为人媳为人妻应该承受的。即使再痛苦，她也不能违背封建礼教和父权社会的规矩。

安梅的母亲成为寡妇一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吴青看上，受到其侮辱之后不得不嫁给他做四姨太。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之前的同一天，她还在六和塔前起誓，保证会恪

守妇道，为丈夫守节。封建社会给她灌输了从一而终的思想，也同样打破了她从一而终的愿望。尽管她不愿意嫁给吴青，但在旧中国女性的观念中，失贞的女人只能嫁给对方，她别无选择。可是她的家人并不理解她，反而以她为耻，不愿再与她有任何关系，她被亲生母亲赶出了家门，还被迫抛下了自己的女儿。她为此承受了莫大的痛苦，而罪魁祸首吴青则未受到任何指责或惩罚。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自己的特权，对自己四姨太所受的折磨视而不见。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安梅的母亲处境的悲惨。

只见她穿着古怪的外国衣服，在我舅母恶言呵斥她时，她并不回嘴。我舅舅，因为她叫了他一声哥哥，便给了她一个耳光，她也不做声，只是把头更低地垂着。外婆去世时，她哭得死去活来，虽然多年前，就是外婆把她从家里赶出去的。外婆的丧事一完，她便听从舅舅，马上又回到天津去了。去那里，当她的四姨太去，完全违背了一女不事二夫的常道。（谭恩美，2010：213）

嫁给吴青后，安梅的母亲承受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迫。心理上，她忍受着内心的耻辱感，家人对她的怨恨与疏离以及对女儿的思念。生理上，她要忍受吴青以及二姨太的折磨。在吴家，她地位卑微，对于吴青而言，她只是发泄性欲的工具。吴青对她没有爱，更谈不上尊重。而她惟一的希望——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因为二姨娘的假自杀而破灭。在绝望之际，她生无可恋，吞生鸦片自杀了。

顾映映原本是一个美丽，纯真，高傲的女孩子，在嫁给第一任丈夫之后，映映失去了自我。她是一个典型的大家闺秀，婚后整颗心都放在了丈夫身上。因为太过依附于男人，她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变得患得患失，也磨灭了自己的个性。为了留住丈夫的目光，她想方设法打扮自己，努力展现自己的女性气质，为了丈夫的一点爱而自哀自怜，逐渐由一个纯真少女蜕变为深闺怨妇。丈夫无数次的背叛和伤害使她的生活变得灰暗。为了报复丈夫，她曾跳水自杀，后来甚至亲手扼杀了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在婚姻中，女性就像是提线木偶，那根线始终被男人握在手中，她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男人摆布和影响。

参考文献

- [1] Hu, N. L. 2007. Self-Rediscovery and Self-Reconstruction of Marginalized Chinese American Women——A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Joy Luck Club [D]. Ph.D Dissertation.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 [2] Ling, H. P. 1993. Surviving on the gold mountain: A review of sources about Chinese American women [J]. The History Teacher 26 (4): 459-470.
- [3] 刘奕, 于睿. 2010. 《喜福会》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 [J]. 电影文学(13): 11-12.
- [4] 刘熠. 2005. 《喜福会》: 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与解构 [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92-94.

- [5] 柳泳夏. 2009. “他者”华人的中国性 (Chineseness) 想象——以旧金山华人文学为中心 [J]. 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5): 26-32.
- [6] 谭恩美. 1989/2010. 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 [M]. 程乃珊等 (trans.).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7] 王赞. 2012. 论谭恩美作品中的女性主义特征——以小说《喜福会》为例 [J]. 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 30 (3): 46-48.
- [8] 吴荣兰. 2006. 从无声到有声——论《喜福会》中华裔女性自我身份的建构 [A]. 福建省外国语文学学会 2006 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下) [C].
- [9]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 1949/1998. 《第二性》 (*The Second Sex*) [M]. 陶铁柱 (trans.).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Mothers' Immanence in *The Joy Luck Club*

ZHOU Ning, Tan Qiongl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The Joy Luck Club* is the first novel of Chinese American female writer, Amy Tan, which helps establish her great reput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Four pairs of Chinese mother and daughter are described at length about their life experiences within the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mone de Beauvoir's Feminist Existentialism, this paper makes an attempt to analyze these mothers with distinctive images, and to expose the oppression suffered by Chinese women.

Keywords: Amy Tan; *The Joy Luck Club*; Feminist Existentialism; Immanence; Transcendence